

# 我校首获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立项

本报讯 8月27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根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和《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项目管理办法》，公布了2021年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拟立项课题名单，我校诸凤娟教授主持的《阳明后学年谱系列（第一辑）》拟立项为重大课题，实现了我校在该项目类别上的突破。

《阳明后学年谱系列（第一辑）》包括13个子项目。其中，诸凤娟主持的《黄绾年谱》，我校“鉴湖学者”讲座教授钱明主持的《徐爱年谱（附<钱德洪年谱><董濬年谱>）》，以及越文化研究院4位青年博士主持的《季本年谱》《王宗沐年谱》《张元忬年谱》《周汝登

年谱》等共计6个项目作为子项目被列为重点项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大学术研究项目。《阳明后学年谱系列（第一辑）》课题经过了长时间酝酿和多方面调研，在申报设计之初即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怀指导和直接帮助，也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省内外专家的大力支持。这次课题的成功立项也是越文化研究院近年来重视深化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积极参与省、市重大文化工程建设的重要成果，为培育越文化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打造新的标志性成果群、提升越文化在全国地域文化的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越文化）

2021 年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拟立项课题名单

拟立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成果形式	拟设级别
阳明后学年谱系列（第一辑）	诸凤娟	绍兴文理学院	系列丛书	重大
黄绾年谱	诸凤娟	绍兴文理学院	专著	重点
季本年谱	崔 冶	绍兴文理学院	专著	重点
徐爱年谱（附《钱德洪年谱》《董濬年谱》）	钱 明	绍兴文理学院	专著	重点
王宗沐年谱	徐国明	绍兴文理学院	专著	重点
张元忬年谱	钱汝平	绍兴文理学院	专著	重点
周汝登年谱	莫尚葭	绍兴文理学院	专著	重点

## 互 辉 的 星 座

——胡愈之与巴金的交往与友谊

●陈荣力

在巴老已走过的人生历程中，许多文化巨人都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就像星座的互辉一样，给中国的文化星空留下了诸多绚丽璀璨的风景。其中近代中国另一位文化巨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进步出版事业先驱、著名政治活动家胡愈之与巴金的交往和友谊，便是此中的典范。

### 一、世界语促他们相识相知

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博士创立了世界语。世界语作为国际社会最省力的一种交际工具，它所具备的简单、明白、富丽的三大优点和实际使用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使得其问世十多年，即为国际社会认可。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曾提出把世界语列为中小学课程，世界语运动由此在中国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出生于浙江上虞丰惠镇敕伍堂的胡愈之，一生热爱世界语，是20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最有名的人物和重要先驱。在胡愈之看来，世界语作为“现代生活所必须的一种工具”、“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的一种新发明的机器”，不但可以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不至侵害国语和民族语，更有利于促进社会革命和文化交流。因此早在1913年，胡愈之还在杭州英语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时，就通过上海世界语函授班的学习学会了世界语，成为世界语运动的热心分子。1914年夏天，胡愈之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世界语。他积极撰写介绍推广世界语的文章，从世界语中翻译俄国和一些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发起成立“上海世界语学会”，开办世界语讲习班、函授班，成为当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骨干领军人物。像吸引胡愈之、蔡元培一样，世界语同样赢得了当时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青睐，鲁迅、周作人、楼适夷、叶君健、胡绳、鲁彦、萧红等等，都是世界语的热衷者，这当中也包括一位16岁的学生——巴金。

1920年冬天，还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书的巴金，怀着求知的热忱，大胆地给《东方杂志》编辑、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的胡愈之写信讨教有关世界语的问题。尽管胡愈之与这位比自己小8岁、当时还只有16岁的学生素昧平生，但一向待人热情诚恳的胡愈之，很快就给远在西南的巴金回了信。胡愈之在信中除了就巴金提出的问题作了认真解答、坦率提出自己的意见外，还勉励巴金勤奋苦学世界语，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胡愈之的回信，如一把火，点燃了16岁的少年巴金学习世界语的热

情。他一边学习，一边奋笔疾书，为世界语的传播鼓吹呐喊。1921年5月15日，巴金便在成都《半月》杂志第20号上发表了《世界语之特点》的文章。可以说，正是胡愈之的这封回信，奠定了文学巨匠以外的巴金，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又一先驱者的最初基石。而双方的这一次素昧平生的通信，也揭开了两位文化巨人，为中国的进步文化事业、为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并肩战斗、并驾齐驱几十年的序幕。

1927年1月，23岁的巴金离开上海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二年留学期间，巴金旅居巴黎、沙多-吉里等地。1928年春天，因从事进步活动而遭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胡愈之流亡欧州。这年初秋，胡愈之也来到了巴黎。距第一次通信整整8年之后，巴金和胡愈之终于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双方的激动溢于言表。胡愈之紧紧握着巴金的手说：“在法国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已拜读了你的文章”。而同样激动的巴金，更为见到这位自己少年时代就敬慕的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一时语噎。胡愈之的谦和平易和巴金的虚心坦率，使两人一见如故。在巴黎拉丁区胡愈之的住所，两人多次倾心交谈，从国内问题、国际问题到世界语和文学、历史，从政治理想、人生抱负到爱国和拯救民众，这样的交谈撞击出的火花，彼此都深感得益。而仿如长兄的胡愈之，其学识和见解更使巴金为之折服。巴黎的会面和交谈可以说影响了巴金的一生，也是他此后终生热爱文学和世界语的缘由之一。1928年，正是列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为纪念托翁，也为了帮助巴金以稿费应付留学的拮据，胡愈之便让巴金翻译当时刊登在巴黎世界语杂志上的文章《托尔斯泰论》，由他推荐到商务的《东方杂志》托尔斯泰纪念专辑上发表，同辑还刊登了胡愈之同样从世界语中译出的《托尔斯泰与东方》一文。

1928年12月，因家庭再也无力供给在巴黎留学的费用，和禁不住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巴金由巴黎回到上海。因与胡愈之的关系及时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秘书、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的介绍，到上海后，巴金很快参加了由胡愈之任会长的“上海世界语学会”，不久又被选为理事，负责会刊《绿光》的编辑并参与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学工作。受胡愈之的鼓励和影响，这期间巴金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好几本书，如意大利爱·亚米契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等，共达30多万字。巴金也由此成为当时“上海世界语学会”乃至中国世界语运动中一位十分重要的战将和骨干。

此后的20多年，因战乱频繁和倾心于小说创作，巴金一度疏远了世界语。1951年3月11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宣告成立，时任新中国第一任出版署署长的胡愈之被推选为理事长，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巴金则被选为理事会理事，这对分别了10余年的战友，又

一次并肩站在了世界语的旗下。1980年，在胡愈之等人的关心和努力下，国际世界语协会正式接纳中国世界语协会为会员。同年8月，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瑞典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的胡愈之，点名委派巴金率第一次参会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赴瑞典。当时不少人劝说巴金年事已高，不要再为此事奔波了，然而已76岁的巴金没有辜负老友的厚望和重托，率团圆满完成了任务。临出国前巴金曾给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语学者陈原写信说：“去瑞典参加国际大会，只是报答愈之的好意。”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坛上巴金庄严宣告：“中国人民通过世界语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世界语学者的风采，因巴金而备受瞩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巴金当选为国际世协荣誉监事（此乃国际世协为表彰各国对文化社会活动有特殊贡献的世界语学者，而设立的最高荣誉，全世界仅十余人）。而一生热爱世界语并为此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胡愈之，亦于1984年的温哥华大会上被选为国际荣誉监事，成为继巴金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如果说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如一面呼唤和平的旗帜的话，那么巴金和胡愈之作为高擎旗帜的两个旗手，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也如明媚的春风一样，让旗帜招展的更加美妙动人。

### 二、文学让他们佳话频传

巴金的写作生涯起步于1921年，那年他17岁，就在成都的《半月》杂志上刊发第一篇文章《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而他的小说创作则始于1927年留学法国期间。1927年，旅居巴黎及沙多-吉利的巴金为渲泄自己苦闷寂寞的心情，求得情感上的丰富和满足，开始了生平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创作。创作《灭亡》的同时，他也开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在《灭亡》创作期间，一位在沙多-吉利城拉封丹中学朝夕相处过的中国同学巴恩波的投水自杀，一直让巴金不能释怀。因此1928年8月《灭亡》写成后，为纪念这位同学，巴金便在作者的署名中取了一个“巴”字，而“金”则受刚译完克鲁泡特金著作的影响。从《灭亡》开始，“巴金”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了下来。《灭亡》写成后不久，流亡欧洲的胡愈之来到巴黎，得知巴金刚写了《灭亡》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翻译、创作了近百万字文学作品，并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的胡愈之十分高兴，他热心介绍巴金与时为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经理的周索非建立了联系。巴金将《灭亡》寄给周索非，原打算用自己翻译高德曼《近代戏剧论》的稿费自费印刷，没想索非将小说稿送给了当时正主持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得悉小说稿到了好友叶圣陶那里，胡愈之又写信给叶圣陶，向他介绍推荐巴金。叶圣陶本来对《灭亡》就十分欣赏，读了胡愈之的信更为重视，1929年1至4月，《小说月报》分四期连载刊登巴金的中篇小说《灭亡》。作为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发行超过一万份的大型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刊登的《灭亡》，使巴金名声大振，并促使他从此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

1931年至1933年，旅居上海的巴金开始

集中精力从事小说创作，并迎来了他小说创作空前的丰收期，他的代表作《家》、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春天里的秋天》《萌芽》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创作、发表的。像所有新星都会遇到的辉煌一样，巴金的名字很快成了当时中国文坛、特别是上海文化圈中一个炙手可热的品牌，许多报刊杂志向巴金的索稿更是络绎不绝。然而成名后的巴金依然与以前一样，每天看书写作，他不大喜欢交际，也不善于同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他更没有忘记老朋友。因此当1931年胡愈之从欧洲流亡回国、并于1932年出任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炮火损毁而恢复重建的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时，对胡愈之的约稿，巴金总是积极从命，从未有半点怠慢。从1932年开始，巴金的《杨嫂》《煤坑》等许多短篇小说和连载的中篇小说《新生》（《灭亡》续篇）等，成为《东方杂志》最引人注目的视点之一。而作为兄长和知友的胡愈之，对巴金的这种真诚支持，更是以尽可能多的帮助作为回报。1933年，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第一次出单行本和《巴金短篇小说选》，都是通过胡愈之，由同为上虞人的胡愈之好友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出版的。1933年7月，由胡愈之替生活书店筹划的《文学》杂志创刊，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任编委，巴金则成为《文学》杂志主要撰稿人。也因为胡愈之和《文学》杂志，在一次杂志社的聚会上，很少参加上海文学界活动的巴金第一次与鲁迅和茅盾等人相识。

而1933年1月发生的《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事件，是胡愈之和巴金在文学上彼此真诚帮助、互相支持的又一个佳话。1932年胡愈之任《东方杂志》主编时，正是蒋介石在加紧“剿共”的同时加剧对文化界的围剿、镇压屠杀进步知识分子之际，文化界毫无言论自由可言。为避免国民党的查禁，胡愈之在1933年1月1日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策划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其用意正如鲁迅所说：“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之假，不如来谈梦境中之真。”新年梦想的征稿，得到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邹韬奋、俞平伯、茅盾、周作人、林语堂、夏丏尊等许多文化名人的响应。而此时的巴金因为写作数量的众多和不同的政治、艺术观念，正陷入一些激进文人和文艺批评家将他列为“第三种人”、甚至诬其写作是为了“贪图巨额稿费”的流言和攻击中。虽然激愤曾致使巴金三个月都不曾动笔，但一见好友胡愈之策划的征稿，他毫不犹豫地给予热情支持，是最早几个写稿的作者之一。在“新年的梦想”中，巴金坦荡地剖明自己的心迹：“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接着巴金又在《我的梦》一文中，驳斥了种种谣言，他写道，那些诬蔑或误解他的人“也许不会知道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会写文章的事情”。为了友情，没有稿费也写文章，巴金承受了误解和攻击；而同样也是友情，胡愈之则为巴金及时提供了剖明心迹的机会和条件。（下转第8版）



胡愈之故居



# 近代绍兴商会的政治参与

●章泽玮

当前关于近代绍兴商会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只有仅见的数篇文章。张佩洁、彭雅琴均认为绍兴商会在商人和政府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在协助政府收税的同时也会反映商人的呼声，为商人争取较低的税额。颜志认为绍兴商会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活动也是有限制的，商会并非全能。刘伟彦认为战后绍兴商会起初在积极争取独立自主的自治权，但在多重危机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以上几位学者都以绍兴商会为研究对象，但研究视角不尽相同，偏向于考察绍兴商会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虽然部分文章有论及政商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其中的利益纠葛，但并未深入考察绍兴商会的政治参与。且在时间上偏向于研究绍兴商会的中后期，鲜有论及绍兴商会初期的发展状况。

1906-1919 年正值社会鼎革之际，社会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动。在此期间绍兴商会经历了两次重大改组，由“山会商务分会”易名为“绍兴商务分会”，再易名为“绍兴县商会”，直到 1919 年左右才最终完成改组。在这一阶段，绍兴商会也逐渐由“在商言商”转向“在商言政”，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频频现身。因此，研究 1906-1919 年间绍兴商会的发展状况和政治参与，不仅可以填补这一时期的研究空白，也有助于揭示绍兴商会与当局政府之间利益纠葛的原因。近代绍兴商会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积极参与政府的政治活动和自发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

## 一、配合政府的政治活动

绍兴商会之设，本是绍兴知府与山阴、会稽知县联合地方士绅，执行上峰组建商会的命令的产物，故商会与政府之间必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并因商会之下聚集着许多商铺，便于政府借助商会向各方商人传达行政命令，故商会也不得不听从政府的指示，配合政府参与相关政治活动。

### （一）纪念庆典

清末绍兴商会参与的重大庆典主要有两件，且都与慈禧太后有关。1908 年是慈禧太后的 74 岁寿辰，会稽县为此照会山会商务分会：“自初七日（10 月 31 日）起至十三日（11 月 6 日）止，按照京师旗彩灯供，量力致敬，不准胥吏借端需索。该县在万寿宫行香设筵庆贺后，仍逐日督访巡警在街察看，遇有拥挤喧哗等事，随时弹压。”绍兴官员在京师看到各店铺为庆寿诞张灯结彩的盛况后，便要求绍兴加以效仿，并令商会传达各商铺周知，同时加强警戒，严禁滋事，足见对慈禧太后寿辰的重视，想必商会也必然郑重其事，妥善行事。

不料，刚办完筵席，慈禧太后就于当年农历十月廿二日（公历 11 月 15 日）去世了。故在诞辰之后不到两周，不得不为慈禧太后举办丧礼，绍兴知府为此又照会山会商务分会：“查[下缺]紫灯白彩以志哀思，业经举行，而绍郡尚无举动，甚至花炮及租用彩轿各铺仍复照常开市，商铺喜庆灯彩亦未悉数除去，殊属不成事体。商会有领袖商界之责，理合照会贵商会总董，希即传谕花炮店、租用喜轿店实行依限禁止交易，其如何竭尽哀思之处，相候自行商议。”其实照会中所说的商铺灯彩未除之事是情有可原的，在旧日交通和信息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商铺得知慈禧去世的消息必然有所延迟。经政府劝导后，商会和各商铺也应予以配合。

民国初年绍兴商会参与的纪念活动主要是节日庆典，比如补庆元旦、补庆新年、补庆民国纪元旦，举办清明植树节典礼等。此外，还

有庆祝盛大政治事件，比如为庆祝大总统的选定等。但无论是庆祝节日还是纪念政治事件，都是由政府组织的，绍兴商会主要是服从于政府并配合地参与活动，其态度是消极的、敷衍的。

### （二）严禁造谣

1913 年，袁世凯要求各地严禁造谣。“上海少数人之托名全国公民，开会鼓吹，有意破坏大局，牵动商业各埠，成交货物纷纷支退。……着各省都督、民政长查禁造谣生事之人，从严惩办。一面剴切晓谕商民，勿堕奸谋，照常营业，即由各处商会分印传单，广为劝导，不得听从痞棍托名勒捐，不得轻信浮言，受人恐吓，并着各该长官督饬军警，竭力保护。”绍兴县为此致函绍兴商会：“除遵将奉发布告分投张贴外，合亟函送贵会，希将令开各节，广为劝导，事先预防，毋滋他故。”

所谓的“造谣”，应是当年 5 月 1 日，上海各党团体为宋教仁被刺一案和《善后借款事宜》一事而声讨袁世凯。此案疑点重重，真假难辨，但当时国民党为发动二次革命，掀起了对袁世凯的舆论冲击，上海各党团体可能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会鼓吹”，“造谣生事”。

电报中云“迭据北京、汉口、上海、苏州等总分商会暨各业公会公所来电”，可见，袁世凯是在接收到各总分商会的消息后才下达的指令。而各总分商会之所以向袁世凯发电，应是“造谣”一事致使“成交货物纷纷支退”，这就严重损害了各商会的经济利益，于是，他们不得不卷入这一事件，请求并依赖政府稳定社会秩序，“所愿商旅不惊，廛市不变，安居乐业”。而政府也怕“造谣”一事引发民变，怕国民党借此节外生枝，故也想要尽快平息此事。于是，二者就达成了利益上的一致，由政府主导，各商会配合，戮力同心，查禁造谣。绍兴商会在接到电报后，也积极响应，张贴布告，广为劝导，全力配合。

### （三）协济募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组建“欧洲协议会”，为解决战后军人、劳工的善后问题募集经费。而中国一直担心会因为未尽到参战义务而丧失在战后和会上的话语权，故视此为尽盟国义务的机会，于是极力配合募捐。

浙江省于同年 11 月 17 日致函各地：“各省先已筹办，浙省未便独后。致于本月十二日在军署会议，由各机关分认劝募，所有各县知事定为特等县八百元，一等县六百元，二等县四百元，三等县二百元。希即照数捐募，解交省公署汇寄，以襄盛举。”绍兴县在接到命令后致函绍兴商会：“查前项协济捐款，本邑奉派定为八百元，案关协济各国兵队华工之用，应分头劝募，以襄盛举。……希即推念慈善义举，酌量捐输，并转致各团体一体协助。其款务于十日内送由县署造册汇寄。”

绍兴商会在接函后号召各分事务所董和各商铺募捐：“还祈广为劝募，慨解囊金，源源而来，多多益善。”但号召的结果并不理想，“兹商业凋敝之时，应募者寥若辰星”。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商人的本性就是追求财富，攫取金钱。因此，想要他们主动积极地参与公益事业，响应募捐，不求回报地付出是极其困难的。

但绍兴商会的领导层并不是纯粹的商人，而是一批有识之士，是“资产阶级化的绅商”，而且商会本身与政府休戚相关，能够积极地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和民政建设。于是，绍兴商会决定自己垫解一百元，函寄县知事。尽管如此，但仍然是杯水车薪，且一直拖延了近两个月，

与要求的十日内送达相去甚远，足见商会并不情愿。

## 二、自发进行的政治活动

绍兴商会参与政治活动，除了有被动配合政府的一面，还有主动介入相关政治活动的一面。而商会之所以会积极介入，根源仍可追溯到其宗旨中之“保全商利”一条。商会的所作所为，其实都离不开这一条，无论是配合政府，还是自发进行，都是为了维持商会自身的利益或商会所覆盖的全体商人的利益。从主动一面观之，尤为明显。

### （一）参与国会请愿

1906 年 9 月 1 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各地绅商“无不欢欣鼓舞，开会庆祝”。但当立宪运动高涨的时候，清廷既惊慌又愤怒，指责各地绅商“浮躁蒙昧，不晓事情……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讹传讹。”至此，人们终于看到了清政府虚伪的面目，杭州商会发布文告：“若循渐进主义，待地方议会成立，始召集国会，恐无以振上下之精神，救目前之危迫”。于是，为速开国会，乃有请愿之举。

1908 年 7 月 23 日，杭州商会照会山会商务分会：“凡人民俱延阻国会成立，各省康续发起，浙人怎可独后，兹由同人刊印，请将签名册分别函送，凡签名者应将年龄、籍贯、出身、职衔书列于上。同此国民志愿，务期全体协力，多多益善。”山会商务分会在接函后，积极响应，迅速办理，“逐日向各商业劝导”，三日后便牒复杭州商会，“兹共签有一百四十名。省垣开会在此，合将签名册三本，具文牒送。”可见，商会在这一政治活动中的积极性是十分强烈的。

7 月 28 日，各府县厅州派代表至省，召开大会，会上通过了绍兴人汤寿潜主稿的请愿书，其中指出强国即在立国会：“无国会，则予夺之权操诸政府，人民率观望不前；有国会，则由人民参订保护工商法律，资本家地位巩固，自能并全力而为对外之竞争。”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多至八千余人。8 月 20 日，浙省代表叶景莱、邵羲、蔡汝霖前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国会迅速成立”。

面对震动全社会的请愿活动，清廷不得不作出妥协，宣布以 9 年为期召开国会，实际上是通过对立宪派的再一次欺骗达到无形消弭国会请愿运动的目的。起初，如清政府所愿，立宪派的请愿热情迅速降温。但当他们识破了这是清政府的又一骗局时，发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请愿活动。1910 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请愿活动，最终，清廷再次采取缓兵之计，宣布“提前”于 1913 年开设议院，并且预先组织内阁。

纵观这五年，各商会主要站在立宪派一侧，寄希望于以和平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于是，他们积极投身于国会请愿运动，“宁肯苟全于清朝政府腐朽统治之下以谋求缓慢的革新，一直要到客观形势所驱迫，他们才蹒跚地走上与封建统治者决裂的道路。”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商会才逐渐转向支持革命。

### （二）抵制日货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视此为崛起的大好时机，于 1915 年 1 月 18 日，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北洋政府几经斡旋，最终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这个条约签订后，在社会上掀起了强烈的反响，抵货运动也由此展开。

4 月 29 日，上海英商卜内门公司致函绍兴

县：“近日发现一种抵制日货传单，将敝公司伞牌皂亦载其内，以致滞销，请即出示晓谕。”于是，县知事致函绍兴商会：“请烦劝导商民，弗稍误会，致碍邦交。”可见抵制日货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甚至出现了“抵制日货清单”，以致西洋诸商惶恐不安，唯恐本国商品被误认为日货而加以抵制。

5 月 31 日，星沙绸布公所呈递了三条中日交涉办法，对于外来货物，一律扣留检查，如是日货，“每规元一两罚长纹一两，大小数目以此类推”，“被罚之货，限一星期内将罚金缴清，方可领货。如逾期不缴，议将该货当众焚毁。有犯二次者，加倍处罚。”可见当时的抵货运动何其猛烈，一经查办，就要被处以罚金，而货物甚至有被当众烧毁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办法是商人自发呈递的。只因国人无法用武日寇，故只能将满腔愤懑发泄于日货，对其严加抵制。既如此，商人也无法经营日货，而其中的爱国之士则会表现得更加决绝，正如呈文所言“敝业同人虽无新智识，亦属国民一份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不过，北洋政府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当它注意到事态即将脱离其掌控，便下令予以禁止。绍兴县在 7 月亦曾三次致函绍兴商会，呼吁绅商对中日交涉案保持谨慎态度。函件指出当前有“乱党造作口书，强谓政府同意日本初案，指为失地丧权，极力诋诬，口散布上项谣言，希图起事，扰乱治安”，故特地说明了签订条约一事的始末，希望国民能理解政府的无奈之举，不要“误信浮言，滋生误会，致使人民爱国热诚，转为乱党乘机利用，酿成扰乱举动”。在政府的管控和各方的斡旋之下，抵货运动最终趋于沉寂。

## 三、结语

绍兴商会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其实都与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近代商人集团的不断壮大，政府为了便于对社会加强管理和控制，就借助商会来实现这一目的。商会在配合政府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在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为了争取自身和商人的利益而向政府提出诉求，甚至会发起激烈的政治运动，开展“超法”的活动，最终使政府与商会的关系由依法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转化为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

商会既是商人的集团，其行为就无法脱离商人的职业特点，而商人往往会从数量上算计任何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当初，绍兴商人同意成立商会，亦是希望商会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即所谓“保全商利”。因此，商会兼事政治是迫不得已的应付办法。无论商会作何举动，都是以商人的群体利益为导向的，而不会注重抽象的正义原则或以某些社会阶层所认定的“普遍真理”为依归。因此，商会与政府之所以达成合作，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利益认同。

当时各个政治团体也正是看到了商会没有预设的政治立场或派系色彩，所以总是倾向于争取他们的支持，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商会也会从“经济理性”而非“政治理想”出发，权衡利弊，暂时选择当前对自身最有利的政治势力合作，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又会选择另一个政治势力。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对于商会来说都只是暂时合作的对象，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变换，商会所求的只是自身利益的稳固。这是由商会自身的属性决定的。

（文中□为缺失字）

（此文系绍兴文理学院大学生越文化研究会学生科研课题“区域社会中近代绍兴商会的政治参与”成果，指导教师：周炫宇）

# 清代台湾官员中的绍兴人

●姜仲安

（上接第 129 期）

## 三、雪泥鸿爪，长留宝岛

清代赴台官员，是代表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国家主权施行者。清代的台岛，许多地区尚处于初开发或未开发状态，官员守土施政，更多一份筚路蓝缕之责。综观清代台湾官员中的绍兴人，大多出身于监生或吏员、供事，他们除了少数率获军功或议叙入仕外，多数只能通过捐纳一途以较低官阶起步。但正因为多出身于久经历练的实际办事人员，在这些人中有不少干员，能实干，有政绩，为台湾的开发治理作过贡献。限于篇幅，兹举二例以代表之。

首任福建省台湾府知府蒋毓英。蒋毓英，字集公，汉军锦州籍，李光地所撰《台湾郡侯蒋公去思碑记》谓其“实浙东诸暨人”。八旗官生出身，相当于汉族的国子监生。康熙二十三年由福建泉州府知府调任台湾府知府。康熙三十五年刊行的《台湾府志》（高拱乾修）卷十《蒋郡守传》载，蒋毓英任泉州知府时，为平台大军“一切措办，游刃有余”，获赠一品服。平台后以众望所归调首任台湾知府。到任后“躬历郊原，披荆斩棘”，划分好下辖的台

湾、凤山、诸罗三县地域，勘地情以定赋税，罢去不急之役，令勿扰当地土著民族。“招流亡，询疾苦”。请开科取士，以兴文教，“至民贫不能备餬哺者，复捐俸创立义学”。任满报迁湖广部巇道时，台人赴省挽留获准。康熙二十八年调升江西按察使，台人泣送数千人，并于所建书院塑像纪念。

在施政百端肇始的同时，蒋毓英于履任的第二年（康熙二十四年）即开始编修首部《台湾府志》，显示了他存史资治的卓识。据厦门大学陈碧坚老师研究，凤山知县杨芳声、诸罗知县季麟光 是蒋的修志助手，季麟光《咨洲文稿》卷一有为人代笔的《台湾志书前序》，文云：“郡守暨阳蒋君始经其事，凤山杨令芳声、诸罗季令麟光广为搜讨，阅三月而蒋君董其成。分条晰目，一如他郡之例……书成，上之方伯，贡之史馆。”惜限于条件，蒋志仅录文稿为三，呈省、留台、自存各一，当时未及刊刻，但其后康熙三十五年刊刻的《台湾府志》（高拱乾修）实多袭蒋稿而成，康熙《福建通志》有关台湾的内容也多辑自该志。蒋志首开官方记载台湾历史地情之先河，其后任又五修台湾府志，各州县厅也各修其志，今《台

湾文献丛刊》中所收志书仅笔者所见就有 35 种。蒋志后幸由家属在大陆刊刻，今存上海图书馆所藏孤本，为《续修四库全书》所收。

道光淡水厅同知山阴人娄云。娄云，字秋槎，山阴安昌西市人。以监生捐补知县分发福建，道光十六年（1836）由福建泉州府惠安知县调任台湾府淡水厅抚民同知。同知是知府的副手，当时台岛大甲溪以北之地俱为淡水厅所属，淡水同知实相当于北部台岛的行政长官。同治《淡水厅志》卷九列传载：“娄云，浙江山阴人，监生。捐设义渡，劝办义仓，续修明志书院。在任二年，颇多善政，人咸颂之。祀德政祠。”卷十五（上）又有娄云所撰的《庄规禁约》和《义渡记》二文，一为治理，一为创设，补充了传略的记载。在此仅述《义渡记》以见其作为之一端：娄云曾因军务三次赴台走遍南北，见山溪河流不能架桥渡水艰难的地方甚多。接任淡水后，先倡兴了重建文庙、增造书院等工程，然后着手设置义渡。当地有大甲溪等四条重要溪河既不能架桥，渡口又为土豪控制借以勒索往来之人，于是以捐俸倡，集绅商民众捐银 8900 余圆，在四条溪河和井水港、盐水港共设义渡六处，又有两处地

方各设浮桥，定好置办渡船、选用船工、年修费用等一切章程，并置买田亩收租生息以资经费。

有幸的是，当年娄云所设六处义渡之一的房里溪义渡今尚存石碑，已从溪河边移置于苗栗县苑里镇房里里顺天宫前大榕树下的碑亭中。碑文仍十分完整清楚，碑石上横书“淡水分府娄示”，中间直书“房里溪官义渡”大字，右部文字是“道光丁酉年起建设义渡，由官给发工食，往来行人随到随渡，不准许索分文，如违鸣官究办”，左款的文字是“加府銜淡水分府山阴娄云建立”。此碑亭已成旅游景点，可见娄云的政绩至今尚为当地民众所称颂并教育着后人。据说李光地所撰《台湾郡侯蒋公去思碑记》石碑今亦留存于台南。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辑的名录中无一人在任教职（教授、学正、教谕、训导），这与台湾的汉族人口来源和习用方言有关。志载清代台湾任教职的几乎全是福建人，尤其是漳州、泉州等闽南人。这一事实恰可有力说明，福建尤其闽南是台湾汉族人口的重要祖籍地，两岸同胞自古就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和源远流长的共同文化传统。



# 试论“无绍不成衙”现象的成因及背景

●徐智麟

“无绍不成衙”是清朝一个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治理现象，衙门是旧时政府称谓。绍兴师爷是明清社会风云际会和绍兴历史文化交融的独特产物，这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且专业性很强的职业群体，曾是明清尤其是清代管治体系中各层级正常运转的重要补充成分。由于在这一群体中的绝对地位和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在官府治理结构和运作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各衙门，造成了“无绍不成衙”现象，换句话说，一个衙门机构要是没有绍兴师爷，就难以正常运转。

## 一、“无绍不成衙”现象特征

### 1.绍兴师爷数量多

绍兴人入幕由来已久，明朝就有不少人作幕并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吏，“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顾炎武也引说“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有一位关键人物是万历年间的山阴人朱赆（1535-1608），年方十七“取冠诸生”，隆庆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内阁首辅。他引进了许多绍兴籍书吏，他们又互相牵引，形成了“绍兴帮”，可谓是清代绍兴师爷兴盛的前奏。

绍兴师爷在顺治、康熙之时，逐渐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绍兴籍的师爷是指绍兴府辖下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的师爷。据《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山会两县做过师爷并有传有名的，就达 150 人左右。光《会稽陶氏族谱》载有作幕经历且有成者就有 39 人，可窥见绍兴业幕人数之多。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

### 2.绍兴师爷就幕广

绍兴师爷游幕区域非常广泛，足迹遍布，并且从督抚两司至府州县大小衙门皆有其人。《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有府、州、县各级衙门 1700 余个。每一州县的师爷多则十数人，少则二三人，如果再加上总督、巡抚、两司衙门中的师爷，数量十分惊人。虽因政务繁简、才干良优、财力大小而有师爷人数之差异，但席位均需即供求关系是明摆的。由于在人员素质，职业影响力和传承上具有无法比拟的行业优势，绍兴师爷在有清一代一直被视为师爷行业的“正宗”，而广布于正印官之幕府。

山阴、会稽两县部分师爷游幕区域分布表

区域	游幕者姓名	资料来源 <small>《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small>
山东	全保、王汝成、王汝庚、朱炳崇、王慎、朱翰堂、石庚、沈潜	27 册 22 页 28 册 47 页、28 册 87 页、29 册 99 页、29 册 109 页、29 册 131 页 30 册 210 页 30 册 172
陕西	茹珍、邵如南、俞树畴、陈寿植	25 册 93 页、26 册 140 页、27 册 27 页、29 册 126 页
山西	王庆恩	28 册 57 页
河南	姜杰	30 册 186 页
河北	陈照、章宝谷、沈家晋	29 册 149 页、30 册 215 页、29 册 155 页
吉林	辽宁黄德光	29 册 152 页
四川	章寿康、章庆、方力煦	29 册 122 页、30 册 187 页
安徽	张渭、潘伯山	27 册 21 页、29 册 135 页
福建	潘绳武、陶庆章、鲁德	27 册 11 页 28 册 64 页
江西	孙畴、俞大猷、诸宗元	27 册 7 页、29 册 153 页、30 册 210 页
浙江	陈士奇、孙凤飞、陶庆水	25 册 94 页、26 册 135 页、28 册 66 页
湖南	沈海、汪翥、沈昌猷、章锡光	26 册 143 页、27 册 4 页、28 册 88 页、30 册 198 页
湖北	范寿楠	28 册 77 页
广东	史善长、汪泉、汪叔、俞思穆	27 册 6 页 28 册 81 页、28 册 87 页、30 册 167 页
广西	汪鼎	27 册 49 页
云南	全祺	28 册 75 页
贵州	陈瑞	26 册 143 页
海南	朱亮奎	28 册 47 页

从表中可看出绍兴师爷游幕的区域非常广泛，足迹遍布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等省，甚至与绍兴相距甚远的吉林、海南都有绍兴师爷的踪迹，充分印证了“无绍不成衙”这一说法。

绍兴师爷的游动性较大，则集中体现了“游幕”的特征。鲁迅的叔祖父周藕琴，24 岁那年由鲁迅祖父周介孚（时任江西金溪县令）推荐，到南昌府当刑名师爷，后又到陕西作幕友，晓律平冤，先后在长安及渭南地区一带当师爷长达 25 年。而汪翥一族则粤中为幕，累至孙辈，如子汪禹九足智多谋屡平冤案，孙汪琮则善于救灾济贫。

### 3.绍兴师爷的整体素质高

绍兴“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在数次汇纳中原主流文化后，历来多有好学笃志者，尊师重教者，耕读传家者。“弦诵之声比屋相闻。”文化传统熏陶下的绍兴人，处事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机，善于言辞，士林中多有妙手文章，兼具出谋划策的本领，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自然会受器重；绍兴人语言幽默、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善于巧辩，也对他们从事师爷这一职业大有帮助，从而易滋生特殊职业群体并流布全国。这充分反映了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士之整体优秀素质——足智多谋、精明能干、多才

多艺、积极进取、秉直守正、忠勇双全。

足智多谋是绍兴师爷的本质要求。清代曾有一首竹枝词写道：“部办分班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说的是中央六部书吏皆绍兴人，虽然未入流，但却很善于谋划。曾国藩多次与太平军打仗，起先总是吃败仗，特别是鄱阳湖口一役，险些丧命。他上疏皇上表示自责之意，有一句是“臣屡战屡败……”其幕下的一位绍兴师爷将此词改为“屡败屡战”。皇上看了奏折，觉得曾国藩虽败多胜少，但不气馁，继续作战，忠勇可嘉，反而予以表扬。

多才多艺的师爷则比比皆是。民谚云：“天下文章出（自）幕府，幕府文章出（自）绍兴。”清吴兴祚其族侄吴楚材受聘师爷获器重，除任公案书记之外，为诸子伴读。后与侄吴调侯共同编成《古文观止》十二卷，与《唐诗三百首》并为双璧，至今畅行不衰。另编有《纲鉴易知录》，毛泽东在他的私塾老师毛麓钟的指导下，读了第一本中国通史著作《纲鉴易知录》，获得了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并终生热爱此书，多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和阅读此书。

秉直守正的绍兴师爷周嵩尧，出身贫寒。25 岁中举后靠漕运总督府任总文案的郑仁寿举荐而任文案，后升总文案。民国时曾先后担任江西、江苏督军专署秘书长，在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免遭涂炭。袁世凯称帝时，作为府幕，直言上书不要逆流而动。抗战时日伪想其出山，他拒而避居乡间，可见其爱国贤能正直。新中国成立后，周嵩尧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是周恩来担任总理后唯一直接荐聘的亲属（系周恩来二伯祖父三子，在同辈中排第六，叫六伯父）。

忠勇双全的绍兴师爷何大庚，原来也想走读书应试做官的路，乡试屡落榜而习幕，后受聘于广州知府、澳门道台。清政府鸦片战争后签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出于反帝爱国的义愤，何大庚以极大的勇气奋笔疾书《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张贴于府学宫，吁请“共行团结”，反对“开门揖盗”，极大地鼓舞了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

胸具家国情怀的绍兴马山人骆照师爷，出身贫寒。清时因战乱，直隶总督衙门积案八、九年，共五百余起。聘骆照入幕清理积案，他夜以继日，仅用五个月时间审结，并总结亲拟《清理积案规条十则》。后被朝廷采纳，颁令各省施行。他心里想的是负案者的艰难处境，思虑的是国家的司法规范。像骆照一样一腔情怀为家国的绍兴师爷在历史上也是举不胜举。

而折射出官员与师爷俱为高素质的一段佳话，则来自于越地望族的柯桥州山吴氏，吴氏家族在明清两朝共出过文武进士 42 人。与徐渭同学的吴兑，曾邀出狱后的徐渭入幕府，使之兴情大好创作颇丰。吴兴祚以“誉望超群彦，风流焯四邻”而成就影响清初文坛的文学幕府。

## 二、“无绍不成衙”成因探究

### 1.异族治理，亟需才专

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集中、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能够风行天下，既是中国幕僚制度及治理方式演变的结果，更是独特的地域环境、独特的人文基因和独特的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产物。

首先，满族于马上得天下后，对治理非常陌生，不悉政务，不谙民情，不懂汉俗，难以有效管理；科举僵化后官员以八股入仕流弊，或素质降或迁腐泥于书本；当时还有“回避制度”，主官不熟地籍。所以需要聘请文化高，懂刑钱的师爷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其次，清初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平定叛乱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的措施，绍兴师爷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主官器重而地位日隆。再三，清代实行正印官负责制，《大清会典》卷五二载：“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为了达到个人集权负责的目的，需要有自己的绝对信任的私人智囊助手，师爷就是这样的工具。同时，地方衙门的公务相当繁杂，主官既不专业又忙不转身，还得避“清官难逃滑吏手”之弊，所以需请师爷来佐治。包括清朝后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清政府衙门的洋务项目日益增多，其内政外交的活动也离不开专业擅长的师爷来佐治。

### 2.崇尚耕读，文风炽盛

绍兴自古以来就是文风炽盛的地方，文人辈出，读书人甚多，从事举业的人比其他地方为多，这从绍兴举人进士的人数可知一斑。明清时期，绍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府学县学书院兴盛，几乎村村设学塾，“下至

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明清两代绍兴的科举业一直名列浙江前茅，绍兴府(不含余姚、萧山)共出状元 9 个，榜眼 5 个，探花 5 个，会元 4 个，进士 744 人，举人 2755 人，尤其是以山阴会稽两县为多。绍兴崇尚通过读书求功名的社会风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绍兴人，使绍兴人纷纷争相通过读书涌向仕途。到了清代，这股洪流更加蓬勃汹涌，前赴后继。如此众多的人获得功名，至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官职有限，进士举人不得不候官补缺，苦待做官的机遇。在此期间他们大量做幕僚，不断壮大幕僚队伍；另一方面，诱使千军万马不断挤向科举“独木桥”，“一将功成万骨枯”，桥上举人面对桥下的又有多少读书人呢?! 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言“读书不成，去而读律”。

### 3.求生善鹭，师爷辈出

绍兴出师爷与人多地少的就业生存环境和不恋乡土的乡风有很大关系。绍兴“地窄民稠”，在经历了六朝东渡、宋室南迁之后，已是“生齿甚繁，地更苦狭，非复昔之地广人稀矣。”祁彪佳统计山阴一县田仅 62 万余亩，人口则超过 124 万，即使丰登之年，亦止半年之食。王思任故言，“民稠则欲不足，欲不足则争，争之不得则鹭，鹭之思，必起于贤智者”。绍兴既是“贤智之乡”，且又“善鹭又善鹭者也”，所以“鹭必极于四方”。明王士性《广志绎》说：“绍兴金华一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庐户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人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

绍兴自古民风勤奋，往往不安于现状，敢于冒险，其乐土重迁的观念比较淡薄，且有耕读之传统，这些都与当师爷需要奔走各地的职业特点相契合，有伸延至做师爷的内在逻辑。同时，从绍兴望族的谱牒查看，绍兴确实是个出师爷的地方，很多人家都是世代习幕，常常是一个家族中出好多师爷，比如鲁迅所在的周氏家族及会稽陶堰陶氏家族，以秋瑾父亲为代表的秋氏家族，以及斗门俞氏、安昌娄氏等都是师爷辈出的家族。加上授受幕业大都在亲友故旧乡缘中进行，亦是对素质品行的放心，所以绍兴籍师爷尤多，同时游幕友情举荐，以及声气圈子的需要，最终形成了官府治理所需求的这个职业群体。

以“百岁堂”为例，周恩来高祖周元棠、曾祖周樵水、祖父周起魁、大伯父周炳豫、二伯父周稣肅、四伯父周貽賡、六伯父周嵩尧、父亲周貽能、族伯周慰农都当过师爷，其中周稣肅还当过江苏巡抚陈夔龙（后升四川总督）的总文案（即首席师爷），周嵩尧还为平息两省战乱立了功。鲁小和是周恩来祖母的堂兄，做过周貽賡、周恩来生父周貽能等学师爷的老师，鲁家不少人也以师爷为业。

## 三、“无绍不成衙”的社会影响

### 1.传播了越地文化

“无绍不成衙”的师爷游幕，客观上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绍兴文化。清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时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即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实际上后两者的通行与绍兴师爷密切相关。随着师爷的大量外出，绍兴话、绍兴酒随之流传到全国，绍兴商人当然是从事贩酒业的主角，然后官场从来都是消费者的最大场所，遍布全国各地的绍兴师爷以及他们的主人们构成了绍兴酒的巨大市场，绍兴师爷的通行把绍兴酒引向了全国。另外绍兴的茶叶、糟品、酱品(腐乳、腊肠)等特产誉播全国也与绍兴师爷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学问有才气的师爷，业余时间也创作诗文书画立说。郭思道长年游幕河南，其所写的《游梁草》《抚豫宣化录》讲述了河南开封等地游幕事况。俞蛟在南北各地作幕，故其所做的笔记《梦厂杂著》记载了桂林、扬州、杭州、南昌等许多地方的人情世况。他们游历山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杨宾的《柳边纪略》被梁启超誉为开边疆地理研究风气之名著，并首次提出档案这一概念。齐贤韩迪周由游幕而官，热心公益，先后创办本乡多所小学，重修《羊山韩氏宗谱》。二十年（1931）主持重修石佛寺。这些都显示了师爷出身的文化人的思考与情怀，对于绍兴文化的弘扬和广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延至现今，“绍兴师爷”成了足智多谋的文化人的代称。师爷著述有孙家晋的《敦素斋幼吟草》，姜杰的《听虚馆文传》，陈士奇的《环山集》《西行随笔》，黄霁完的《归鹤集》《长白山后集》，史善长的《轮台杂记》，俞树畴的《俄土记略》，沈凤飞的《砚香词》，许思渭的《托仇笔山卖酒》信,俞蛟的《梦厂杂著》,施山的《通雅堂诗钞》《姜露庵诗集》。

### 2.增添了绍兴名士光彩

毛泽东赞誉绍兴“鉴湖越台名士乡”，明代袁宏道曾说：绍兴“土比鲫鱼多。”绍兴的名士，或为一代宗师，或为群伦表率，当然影响和滋养着绍兴的读书人，师爷群体概莫例外，他们中间涌现了很多贤良名士，并为之争光添彩。爱国爱乡抗倭且诗文书画俱为大家的徐渭；业幕修志的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等，提“六经皆史”，作史“贵知其意”，共创浙东学派。其他如山阴名幕姜春蕃在八国联军围攻津埠的险恶环境中，带练兵千余名与敌军对峙，英雄抗击外侵。师爷出身的辽阳知州徐庆璋，为抗击日本侵略兵，坚守辽阳长达 5 个月。有清一代几乎所有封疆大吏身边，都有绍兴师爷作为高级助手，如章士杰（曾国荃师爷）、马家鼎、俞廉三（张之洞师爷）、程荫棠（左宗棠师爷）、高馨圃（岑春煊师爷）、陶庆仍（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师爷）、姜春蕃（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师爷）、金宝书（杨昌浚师爷）、王汝成（陈庆偕师爷）、汪玉泉（刘坤一师爷）、马心田（丁宝桢师爷）。周守赤做刑名长达四十余年，深得两江总督曾国荃、两江总督张树声、安徽巡抚陈彝等人赏识等。他们当中既有才学超人，办事公正，惩治歹徒，为民请命之人（如清代雍正年间善修水利的童华、道光年间善断奇案的骆照、同治年间为民除害的马心田），亦有坚持国格，捍卫民族正气之杰（如道光十二年起草《全粤义民公檄》怒斥英国侵略者的何大庚），还有孙中山的幕僚邵元冲、蒋介石的幕僚邵力子、阎锡山的幕僚俞家骈、傅作义的幕僚曾又警、张作霖的幕僚任毓麟。这些人忠于职守，为国为民，他们的业绩或青史留名，或为民间百姓所传颂。

### 3.打造了传统“幕学”标杆

在清代如何做好幕友即师爷，成为了专门的学问——幕学。究其本，不外乎指导宗旨和实用技艺。著名师爷汪辉祖说，作幕者“不可不立品”，幕业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也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师爷有自己的立身律己的准则，幕德乃幕道之本。

其一，尽心尽言。尽心就是全心为主人着想，全意为主人办事，努力排忧解难。尽言就是“尽心之欲言”，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决不随便迁求。为了尽心尽言，不应怕主人感到逆耳，不因怕失掉幕馆，只有这样才算是人品高洁，才能获得声誉。

其二，正心洁守。正心就是“立心要正”，主要指处理公务时分清公私。洁守就是要有廉洁的操守，即处理公务时要廉洁不贪，“不想昧心钱”。如果没有操守，没有敬畏，办公务时就会心偏徇私。

其三，俭用勤事。俭用指生活俭朴，不尚奢华不近声色。越地名师爷汪辉祖说：“古也有志，俭以养廉。”勤事就是勤于职守，办理幕务要勤而不惰，全力去办。

其四，慎交虚心。能否正心洁守位用，与是否慎交朋友很有关系，因为交友不慎，不仅应酬易难维艰，而且“致有不能自立之势”。所以慎交是律己的重要准则。虚心，是对幕主的意见要虚心听取，不能自以为是。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写道：“然贫者士之常，阿堵物适足为身心之累。苟得簞食瓢饮，息影潜踪，啸傲于稽山鉴水之间，于愿足矣。”

幕德之标杆如此，幕艺亦然。且不论诗文笔墨琴棋书画，仅幕业实务到研究应用，从归纳总结到思考广大，都有经验之谈，精要之言，汇总经典。自有幕府以来，无论是实务还是理论，清代都发展到了顶峰。如：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张光月辑《例案全集》；祝庆祺编《刑案汇览》；姜春蕃《生平事实册》；王又槐《办案要略》《刑钱必览》；澹泊居士《官幕秘传》；张鉴瀛《宦乡要则》；饶旬宜纂《奏折谱》；骆照《清理积案规条十则》；张廷骥编《人幕须知五种》；施山《姜露庵杂记》；王贤仪参修《大清律例》；清山阴人周守赤编著《刑案汇编》十六卷等。



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的绍兴师爷博物馆



# 关于青藤书屋之“青藤”考析及建议

●张荣锋

青藤书屋的天池西头墙角有葱郁遒劲的老藤一株，青藤长得很好，郁郁葱葱，爬过高墙，枝蔓附满墙头屋檐，向空中伸展，成为阴凉的翠盖，这自然就是青藤书屋名称的本源了。每年有很多外地的艺术家专程跑到这里来看一看，尤其是搞国画的，瞧一眼那根老藤就热泪盈眶。那么青藤究意是哪种植物？它又有什么文化内涵？

### 一、青藤与徐渭的紧密关系

1.青藤是徐渭的别号。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青藤居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在众多徐渭的别号中，“青藤”是他最喜爱的也是用得最多的别号，可见徐渭对青藤超乎常人的喜爱和真情。

2.青藤是徐渭居所字号。徐渭 10 周岁那年，在自家书房里的南窗下曾亲手种下一棵青藤，从此经常与青藤相伴，并将自己居住的“榴香书屋”改为“青藤书屋”，可见徐渭不大喜欢“榴香”，而更喜欢“青藤”，他对青藤书屋有着特殊的感情，曾作《青藤书屋八景图文》，又亲绘《青藤书屋图》。

3.青藤是一个画派旗帜。青藤书屋是中国泼墨写意画派的发源地，是画家眼里“圣殿”，徐青藤是这一青藤画派的开创人，被尊为青藤画派始祖，所以青藤是这一画派的旗帜。明末大画家陈老莲曾慕名来此寓居多年，一位极为崇拜他的女画家王玉英在此住过两年，因此屋内有副对联写道：“牵萝补屋王玉英，固树作堂陈老莲”。郑板桥甘作“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更是赞不绝口，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4.青藤是徐渭的灵魂。青藤书屋小院内那株苍郁青藤，简直就是徐渭的化身——扭曲，狂狷，坚韧，青藤那种独具魅力的生命力，就是徐渭的灵魂和他坎坷、落魄、凄惨一生的象征。2017 年在全国巡演的明星版越剧《青藤狂歌——徐渭》，徐文长先生墓前写的是“万古青藤”，2017 年不易斋写的《青藤之魂》，2021 年周能兵写的《500 年“青藤”，何能傲立天地？》，2021 年 5 月徐渭故里举办了“畸人青藤——徐渭的故事”特展。这些都将“青藤”比作徐渭的灵魂和命运的象征。

### 二、青藤究竟是何物

根据以上分析，得知青藤对徐渭及其所从事的艺术是何等重要。《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清嘉庆九年）描述：“山阴县治南里许，有青藤书屋，为明徐文长先生故宅。宅故有青藤一本，枝幹蟠屈，大如虬松，为先生手植。藤覆方池，宽径十尺许，名天池。”青藤

立于幽寂的墙角，顽石之中终年常绿，枝繁叶茂，藤下壁间嵌隶书“漱藤阿”石碑。

笔者是从事林业工作的，对植物种类和植物文化比较感兴趣。20 多年前我第一次游览青藤书屋，一眼看到大名鼎鼎的“青藤”竟是一株紫藤时，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所谓“青”有常青常绿之意，也就是终年常绿，眼前怎么会是落叶的紫藤呢，从此在心中深深地打下了一个问号，多年来也一直在探究真相。

由于“青藤”是一种俗称，或者是土称，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哪种植物，属何目何科何属何种，学名是什么。

1.目前青藤书屋的“青藤”实际上是一种紫藤。自徐渭逝世到陈氏购得青藤书屋为止的二百年间，书屋至少换了八个主人，书屋和青藤也屡遭劫难。近 500 年来，青藤书屋虽经历了很多变化，但经陈氏及其后人的保护，目前尚较完整。1953 年陈氏捐献给政府。后在“文革”期间，先是被隔壁的章家桥小学占为活动场所，后又被绍兴粮机厂占用，青藤书屋变得面目全非，珍贵的青藤也被连根挖除。1979 年知名文史专家陈惟予老先生负责修缮了青藤书屋，并到大禹陵的后山上挖了一株藤，但不是青藤，也只能将就用，这在陈惟予老先生口述的《“动后余生”的青藤书屋和大禹陵》一文中讲得很清楚。现在青藤书屋里的青藤是后来补种的紫藤。

2.历史记载青藤是薛荔（木莲藤）。根据〔清〕徐元梅（当时任山阴知事）等掌修的《嘉庆山阴县志》记载：“青藤书屋旧在府治东南一里许，前明徐渭故宅，郡人平午村笔记云，青藤者木莲藤也，生于天池之旁……”。清代人钱泳《履园丛话》从话二十园林“青藤书屋”条，谓：“青藤书屋在绍兴府治东南一里许，明徐文长故宅，地名观巷。青藤者，木莲藤也，相传为文长手植，因以自号……”。这里要强调的是，《履园丛话》的作者钱泳，正是清嘉庆九年（1804）12 月《陈氏重修青藤书屋记》碑上文字书写人，他到过青藤书屋，见过青藤，对书屋和青藤文化很熟悉，所以应该不会错的。越文化研究会地方文史专家方俞明先生在《青藤二章》中，也对青藤作了详实分析，断定青藤为木莲藤名副其实。乾隆《绍兴府志》卷之七十一、古迹志一、宅中记载“徐渭爱慕青藤长于顽石之中，而终年葱绿倔强孤傲的性格……”。这里写的长于顽石之中和终年葱绿只能是薛荔青藤。因为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记载青藤是紫藤的文字资料未曾发现。另外，我与撰写“徐渭手植青藤”

一文（刊登于《中国奇树异木》书中）的园林前辈葛先生等有过交流，他们也认同我的观点。

3.不补种薛荔的原因。我想不补种薛荔，而补种了紫藤，主要原因一是薛荔主干不明，适合的难找，10 多年来我一直在留意，但也没有找到理想的薛荔；二是难以移栽，因生长在墙壁、岩石中，挖不了，难种活；三是整株移植的话，则成活难，恢复慢；四是青藤书屋修缮时，时间紧，资金缺，任务重，百废待兴，有大量物件要修复，很难有精力面面俱到，能做到这样已很努力，实属不易。

### 三、薛荔与紫藤的区别

中华民族很早就对自然界的植物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审美经验，植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然之物，而是被赋予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很多植物成为自然之美和文化之美的结合体，从而唤起对人的生命、精神、人格的尊重以及对人生道理的领悟。就像梅花，高洁、傲骨、贫寒，象征着坚韧不拔，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它不仅是清雅俊逸的风度，使古今诗人画家为它赞美，更以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神而为世人所敬重。中国历代文人志士爱梅、颂梅者极多。竹子象征着顽强的生命、青春永驻、高风亮节、柔中有刚、虚怀若谷，宋代苏轼对竹子更是情有独钟：“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那么薛荔与紫藤在自然之美和文化之美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1.紫藤。落叶藤本，枝较粗壮，枝干皮呈深灰色，总状花序，花冠紫色，花量大。象征着大红大紫、富丽堂皇、芳香逼人和豪放的气派、伟岸的雄姿，这可从李白的《紫藤树》和李德裕《忆新藤》等诗中得到印证。“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李白）“遥闻碧潭上，春晚紫藤开。水似晨霞照，林疑彩凤来。清香凝岛屿，繁艳映莓苔。金谷如相并，应将锦帐开。”（李德裕）

2.薛荔。常绿攀缘性藤本植物。别名“木莲藤”“凉粉果”“鬼馒头”等。常攀附于墙壁、顽石或树干部。其成熟的隐花果能制作凉粉、木莲豆腐。古时绍兴城中围墙、岩石上很普遍，现在城中题扇桥、长桥、八字桥和一些岩石、树干部也有。由于薛荔生长在恶劣的顽石、墙壁环境中，还能不断生长，象征着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生命不息、生机勃勃的精神；在楚辞中，薛荔又是美好的品德的象征，如“揽木根以结兮，贯薛荔之落蕊。矫菌桂

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离骚》）“罔薛荔兮为惟，擗蕙橐兮既张”。（《湘夫人》）而在唐人以后的诗中，这又是冷落甚至凄惨的写照。如“惊风乱帖芙蓉树，密雨斜侵薛荔墙”。（柳宗元）“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

以上可知，顽强、坚韧、弯曲、苍郁薛荔的青藤，更象征着徐渭坎坷、落魄、凄惨、传奇的一生；而用富丽、芳香、豪放的紫藤象征徐渭的一生，可能不是很妥。

### 四、建议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对“青藤”不再造成误解，为了告慰 500 周年寿诞徐渭先生之灵，我们有必要还原其历史真相。

1.寻找适宜薛荔青藤。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寻找筛选适合的薛荔青藤。

2.在适合地方进行补植。今年是徐渭先生诞辰 500 周年，正在实施“青藤书屋周边综合保护工程”，并新建徐渭艺术馆。值此良机，在青藤书屋内适合处（要将紫藤处换成薛荔藤很难，也不妥）或在徐渭艺术馆补植薛荔青藤，以告慰先生之灵。

3.进一步弘扬青藤文化。通过研究、宣传、补植薛荔青藤等工作，进一步弘扬青藤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徐渭及其艺术的真谛。



## 互 辉 的 星 座

——胡愈之与巴金的交往与友谊

●陈荣力

（上接第 5 版）1977 年 5 月 25 日，历尽十年浩劫的巴金，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熬过艰难岁月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远在北京、已 81 岁高龄的胡愈之读后欣喜若狂，他亲笔给巴金写了一封信：“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来看，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的老友感到无比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73 岁的巴金接到胡愈之的来信更是热泪盈眶，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愈之是我认识五十余年的老友，看到他的手迹，我很高兴。”

从少年、青年到老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考验的真挚情谊所催生、所滋养的佳话，对任何一个稍具情感的人而言，都是为之动容的。对胡愈之和巴金来说，文学或许只是承载这种真挚情谊的道具或动人佳话的载体。

### 三、共同的追求使他们肝胆相照

如果说世界语让他们相识相知，文学让他们佳话频传，那么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激荡和时代风云的洗礼中，投身进步事业、为了正义和真理献身的共同志向和追求，更使胡愈之和巴金成为肝胆相照的诤友。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英租界巡捕枪杀游行、示威工人和学生的“五卅”惨案。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索，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五卅”运动迅速由上海向全国蔓延。在“五卅”运动中，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的胡愈之，不但直接投身斗争第一线，参加抗议、示威游行，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同创办为“五卅”运动助阵呐喊的《公理日报》；更以一个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撰写了详细报道运动真相的 3 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五卅事件纪实》。“五卅”运动，

同样震撼了时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的热血青年巴金的心，他勇敢地走上街头，积极参加南京学生的抗议声援活动。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以“护党”为名发动了叛变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闸北宝山路血流成河。目睹蒋介石反动派血腥暴行的胡愈之，怀着极度的愤慨，不顾血雨腥风下的自身安危，起草并联合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六人，向当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三大知识分子”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发出著名的“四·一二”抗议信。胡愈之等人的此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四·一二”事变发生后，远在巴黎留学的巴金同样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站了出来，他连续写了《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文章，发表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报刊上，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敬意。在 1928 年巴黎会面以前，胡愈之和巴金尽管还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们无畏地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实践和行动，却无疑为他们成为肝胆相照的诤友，奠定了信念和志向上的基石。

毋庸讳言，巴金早年曾比较执着地追求过无政府主义，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而胡愈之早年亦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1931 年，胡愈之流亡欧洲回国前，曾在苏联参观考察了一星期。亲身感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新生和巨变，使胡愈之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由倾向无政府主义转而向往社会主义，并因此写了曾影响、引导过几代人的著名报告文学《莫斯科印象记》。1931 年仲夏的一个早晨，烟雨朦胧的黄浦江边，当巴金与刚从莫斯科风尘仆仆归来的胡愈之第二次相逢，听着胡愈之激动地讲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时，年轻的巴金心中亦从此植下了社会主义的基因。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曾在绍兴府中学堂直接受教于鲁迅的胡愈之与冯雪峰等，实际负责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活动；而一踏上文坛便为鲁迅赞赏并深受鲁迅关心爱护的巴金，则与黄源、胡风、欧阳山等人一起直接为鲁迅扶柩。如果鲁迅是胡愈之和巴金共同敬仰的师长的话，那么鲁迅的思想和风骨，更是引导他们勇敢地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共同精神元素之一。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上海成立了抗日救亡协会，胡愈之被推为协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副部长。在胡愈之等的支持下，郭沫若和夏衍创办了《救亡日报》，邹韬奋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茅盾和巴金创办了《呐喊》周刊。《呐喊》出版到第三期，发生了禁止发售上述三种报刊和报童被打事件，茅盾、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联名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交涉，才给予重新办理登记手续。《呐喊》就在此时改名为《烽火》，并在刊头标明“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事实上茅盾此时已离开了上海，因此《烽火》的编辑和发行实际上都是由巴金一个人负责的。在巴金的努力下，《烽火》成为抗战初期在上海、广州、重庆以及内地有广泛影响的抗战文学刊物，而胡愈之对《烽火》的关心、支持，也始终没有中断过。1938 年 3 月，巴金离开上海经香港到广州，5 月，胡愈之离开上海经香港赴武汉途中亦来到广州。在广州，胡愈之、巴金、茅盾等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召集在粤文化界人士共同商谈由胡愈之负责首编的《鲁迅全集》在广东的发行工作。广州沦陷后，巴金等众多文化人士被迫西撤到桂林，胡愈之从武汉撤退后也辗转来到了桂林。在桂林，胡愈之领导建立了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巴金则与夏衍一起组织成立了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

分会，他们共同支持甚至并肩战斗，成为战时文化名城桂林文化救亡的重要核心人物。1939 年 2 月，巴金离开桂林赴孤岛上海闭门创作；1940 年夏，在完成“激流三部曲”最后一部《秋》后才返回大后方重庆、成都。而此时，胡愈之则受周恩来的委派赴新加坡从事文化救亡工作。从此，这对肝胆相照的战友，天各一方，近乎 10 年未通音讯。直到 1949 年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才在北京重逢。

建国以后，胡愈之和巴金忙于各自的工作，较少联系，只有巴金到北京开会或胡愈之去上海出差时才有机会晤面，但十年浩劫很快又让他们天各一方。“文革”中，受周总理保护处境稍好的胡愈之，得悉巴金在上海受残酷折磨后心情十分悲愤，他特别担心巴金的生命安危。1973 年，胡愈之率全国政协参观团到上海时，曾冒着风险提出要见一见巴金，但未获批准。1978 年，当胡愈之又一次率全国政协参观团到上海时，终于圆了重见巴金的梦，此时胡愈之已 82 岁，巴金也已 74 岁了。回京后，胡愈之对家人说：“这次去上海，见到了经‘文革’劫难后的巴金身体还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1986 年 1 月 16 日，胡愈之在京逝世，正患病并摔伤卧床的巴金，得知消息后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和深深的眷恋，挥泪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作为一位 90 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和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件；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也是我的生活道路。”

星座因互辉而愈加璀璨。从 1920 年第一次彼此通信相识，到 1986 年生死永隔，整整 66 年的赤诚相向、肝胆相照，这样的精神财富，不但属于胡愈之和巴金两位文化巨人，同样更属于全人类，璀璨于人类的星空。